

「湖北文史集粹」

教育 科技 医卫 体育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湖北文史集粹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
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年 武汉

教育 科技 医卫 体育



目 录

教 育

私塾生活回忆	匡计洪(1)
汉口私塾的演变	李云芳(10)
湖北的书院概况	李骧五(15)
张之洞与两湖总师范学堂	朱峙三(20)
经心书院述略	杨湖樵(27)
回忆两湖书院	陈英才(34)
武昌的武普通中学堂的概况	李愈友(44)
鸿文书院二十年史略	董华祖(50)
武汉的书院和学堂	曾昭安(56)
废除科举后的宜城教育	罗成秀 李伶俐(67)
在辛亥革命中诞生的新堤商业学校 ... 林达放	魏光国(74)
湖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记	艾毓英(77)
朝阳学院在沙市	程幸超(85)
民初至抗战前的天门教育概况	金家修(100)
大革命时期的鸿文中学	知 真(103)
武昌张楚中学纪略	邓 谷(107)
我所知道的正源中学	林美谦(111)
我和大公中学	朱贡西(120)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大冶苏区教育	刘 钧(125)

有关天门中学及我个人的情况·····	李延禧(130)
我在湖北省立第一女中的情况·····	李延禧(139)
关于学校教育的几则回忆·····	龙时乘(144)
从省五中到省襄中·····	王之铮 肖 肃(151)
抗战前农村短期教育的情况回忆·····	朱 明(160)
烽火中诞生的胜利小学·····	李义川 张洪恩(164)
记天汉县第一抗日中心小学·····	黄在衡(169)
抗战初期的国立湖北中学·····	崔力明(173)
在国立第十二中学的十个月·····	王延杰(178)
湖北的“联中”和“计划教育”·····	王延杰(183)
忆抗日时期的湖北联中·····	吴国顺 万汉民(191)
主持湖北“六高”校务的回忆·····	郑万选(212)
创办于崇阳高枧的湖北省立第一高级中学·····	沈维亚(224)
回忆五峰山湖北省立教育学院·····	陈友松(231)
我与湖北农学院·····	管泽良(240)
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在恩施建校始末·····	万汉民(250)
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剪影·····	贾修龄(254)
湖北第三儿童教育院始末·····	茹久平(259)
记原湖北省第三育幼院·····	茹久平(266)
战时难童逃亡记·····	张 芬(275)
我所知道的“三三完全小学”·····	刘正安(285)
抗日烽火中的建国公学·····	黄建夫 杜汉生(288)
我对抗日战争时期鄂豫边区办学的回忆·····	陈贤炳(294)
抗战初期的天门旅省同学会·····	朱鸿恩(303)
民国时期的大冶县立中学·····	刘 钧 毛济美(309)
荆门市第一所完全中学·····	彭兴中(315)
我与应山县立初级中学·····	柯烈梧(323)

忆湖北省立宜昌小学..... 黎祥垵(330)
湖北省立宜昌高中史略..... 朱国楚 黎祥清(338)

武汉大学杂记..... 曾昭安(343)
我当师范学校校长的苦与乐..... 刘忠焱(365)

蕲春启明中学始末..... 陈中元(372)
涂家琛先生和他创办的“精益学校”..... 程延炽(376)
我所知道的向上女子小学..... 李成信(391)
解放前夕的广水私立德馨小学..... 陈国贵(395)
梦醒中学始末..... 彭文之(400)
回首应城西河中学..... 张树德 姚幼安 赵维纯(409)

民国时期鄂城的特种教育——中山民众学校
..... 盛耀乾(422)
我与宜昌的盲童学校..... 黄能贵(425)
蒲圻聋哑学校..... 张海涛(434)
洪湖水上学学校..... 周永新(439)

国民党统治时期湖北教育界派系组织明争暗斗
..... 王益昶(442)
湖北教育界的派系斗争概略..... 李驥五(455)
旧湖北教育界的明争暗斗..... 王郁之(471)

记武昌华中大学..... 艾玮生(486)
记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 徐家麟(495)
我所经历的教会学校..... 李辉祖(502)
我在江汉中学十年的经历..... 陈英才(513)

武昌文华书院的始末·····	卢春荣(519)
武昌文学书院的回忆·····	段继李(524)
记汉口博学书院·····	王楷元(533)
希理达女子中学的见闻·····	饶蓆华(537)
上智中学的演变·····	陈元亨(542)
武昌文华书院及其身后华中大学·····	韦卓民(548)
哀欧拿女子中学五十年·····	刘自铸(565)

接管天门中学前后

——兼怀于盛兹校长·····	邓仲禹(576)
解放初期的京山教育·····	李龙文(595)
在我兼任扫盲秘书的年月里·····	刘昭良(599)

恩施财校创建国家级重点中专的片断回顾·····	王功博(603)
发展恩施州职业教育的回忆·····	李荫华(615)

科 技

新化邹氏地学与武昌亚新地学社·····	文浩然(631)
1949年前的湖北气象科技·····	罗昭彰 孙承训(647)
黄陵庙及其水文研究·····	袁登春(657)
我国气象事业的开拓者涂长望·····	叶 诚(665)
长江大桥的第一设计师李文骥·····	唐秉澄(672)
名彪铁路史册的杜镇远·····	胡兴德(678)
照耀桔乡的福星·····	陈精求(685)

医 卫

我和湖北省立医院·····	杨光第(696)
抗战时期的湖北省立医院·····	何钦圣(701)

湖北省立宜昌医院的来龙去脉·····	杨实舜(706)
1949年以前的宜昌私人医院·····	卢维秋(719)
创建湖北医学院的前前后后·····	朱裕璧(723)
我所知道的湖北医学院·····	何钦圣(730)

湖北最早的医科大学校长陈雨苍·····	宿通权(737)
湖北医学院创始人朱裕璧·····	刘忠武(743)

武汉第一个教会医院——普爱医院·····	胡学汉(758)
德安普爱医院·····	胡学汉(766)
忆普济和仁济到夷陵医院·····	魏良来(771)
私立夷陵护士学校述略·····	侯一夫(777)
1949年以前襄樊的同济、德来两所教会医院 ·····	王道明 文世方(782)
樊城方济医院·····	熊德云(791)

乐园合作医疗发展简述·····	李永海(795)
南漳县防治“血吸虫病”纪实·····	南漳县防疫站(803)

体 育

从“东亚病夫”到冲出亚洲·····	孙耀华(808)
1949年以前参加第七届全运会的回忆·····	居 彤(812)
二三十年代的“宜昌球会”·····	张常武(819)
忆三十年代初的鄂西运动会·····	张卓然(826)
足球、篮球场上往事录·····	李铁仙(836)
鄂北运动场的兴建和首届鄂北运动会的概况 ·····	段祖国(842)
忆潜江县首届运动会·····	吴克家(847)

宜昌龙舟赛史话·····	易史惠(850)
从“穿花”到“跳红灯”·····	吴蕾芬(862)
“国球”训练基地定点黄石始末·····	季 征(866)
国家乒乓球队训练基地的定点和建设·····	黄浩军(871)

私塾生活回忆

匡计洪

1937年秋,和我同住一个墩台、曾任洪湖苏区最早的烈口列宁小学校长的刘邦瑜先生,在我家开馆执教。五岁的我,这时就顺便发蒙了。当时念的是国语。如“人手足刀尺、山水田、马牛羊、鸟虫鱼、我你他”。我得益于祖母教给的儿歌,这些书念起来并不费劲,“包本”很快。但要握毛笔写字就不行了。启蒙先生特地为我写了一张“红”引本。蒙学阶段许多事都忘记了,唯独对“红”引本记忆犹新。内容是“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尔小生。八九子。佳作仁。可知礼”。旁边落款“小学生匡祺鸿”。这个学名是刘老先生赐的。祺是匡氏派衍;“鸿”乃大也,其志远也。寄托着老先生的一种愿望,希望我能怀鸿鹄之志,大展鸿图。说实在话,从我发蒙那天起,就对这两个繁体字很不高兴。红引本上的大字我倒能照着引本依葫芦画瓢,但对落款的名字,笔画多,怎么也涂不好。我清楚地记得一次不小心把名字涂歪了,老先生在“祺鸿”两字的旁边各画一个撑撑着。并警告我,这次算了,下次再写不好自己的名字就要打手板了。在大学长们手把手的帮助下,花了好大的劲,我才勉强能写这个名字。

我入学一个时期后,红引本上的字全能读能背能认了,还勉强可以单独握笔涂写,于是先生就用黑毛笔发了新引本。内容为“一

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要求用学书纸蒙着照写，尽管那种纸极薄，但较之红引本难度增大。读罢上述引本，接着写的是“十二生肖”与“六十年甲子纳音”。什么“甲子乙丑海中金，丙寅丁卯炉中火……庚申辛酉石榴木，壬戌癸亥大海水”。当时仅五岁的我，背熟“六甲”要费很大的气力。不知是什么时候，我才懂得把“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记住，而且只要知道一个年候就可以毫不费力推算出六十年。这真是“死记硬背花人劲，科学方法才简便”。那年放冬学时，先生将引本上的部分生字打乱顺序，在我习字纸反面写给我认，我几乎都认得。这时先生兴趣来了，把引本上所有生字都写出来，但没有一个字卡住我。其中有几个难字略加思索便能很快记起。先生夸我悟性过人，记忆力强，将来必成大器。

第二年上学不久，开始念《三字经》和《增广贤文》。什么“昔时贤文，诲汝谆谆，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等等，较之国语难记多了。好在这些书只要求能念能背就行了，而引本上的字则要会读，会写，倒是引本学得实在。引本的内容首先是宣扬封建伦常道德，但能帮助掌握文字工具，阅读应用，还可学习一点自然知识、生活知识和历史知识。记得第二年的引本是《百家姓》，既写过“孔师阙党”，也写过“赵钱孙李”。继而是农时 24 节，“石斗升合”等杂志，这些内容通俗明白，易知易行。后系统练习《神童诗》、《千字文》。这些诗主要是激励发奋读书及对四季景色描写。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有不少落后于时代的陈腐观念，什么“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千字文》内容广泛，如开头的“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等。它涉及天文、地理、历法，有不少字句还涉及文史、教育、哲学。它提倡义、礼、智、信，推崇敬老养亲，友爱兄弟，诚实守信，克制忍让。随着引本内容的加深，要求也越来越高。比如对引本上的字要能听写，还要求在大字旁脱手写出小字，

字数由一个到多个,这些为以后临摹打下了基础。

1939年春,近六岁的我进私塾攻读《四书》、《五经》。所谓“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所谓“五经”,即《诗》、《书》、《易》、《礼》、《春秋》。私塾先后设在我家邻居、邻台,最远的也不过半公里。前后任教的有四位先生,其中有一位是从外地请来的。年龄最大的数聂老先生,是本县柳关人,当时已七十高龄,背驼,戴老花眼镜,爱抽旱烟。他人很忠厚,教学专一。最年轻的是时年不到20岁的项浩源先生,他是本县福田寺项家门人,出生书香门第,才华横溢,尤受黄埔军校毕业的堂兄项丽源的影响,思想比较开明。项先生退休前在湖南衡阳有色冶金机械总厂工作,是塾师中唯一健在者。

堂叔升泮先生从外地回乡执教时,住在茅草棚,后面住家,前面供学生读书。当时的私学瓦房可以盖几片玻璃瓦,草房就十分阴暗了。我们仿效老祖宗“凿壁借光”,把四周草壁抠得大眼小窟窿。叔叔并未训斥、也未打骂我们。叔叔没有后裔,很爱侄辈,为我和堂兄计煜各起了一个别名,俗称官名。兄为少甫,我为少章。

还有一位熊先生,监北人,正值中年,是我读私塾八年、唯一打我一板的塾师。一次熊先生外出前先为我们上新课,并在每一个学生手指上用红笔画上记号。他规定返校时若书没背熟或手上的红记号掉了,就要罚打。我将新课背熟后,便和小伙伴逗打玩耍,将手上的记号全弄掉了。先生回校后让每个学生伸手检查,我的手上没有红记号,先生拿着板子要打。我不服气,先生大怒,我见势不妙拔腿就跑,先生一板子打在我的背上,后来每到变天就隐隐作痛。

有一次,一位大我八岁的学生,不知犯了什么规,先生拿着长竹板要打他的屁股。先要他睡在一条长板凳上,头和脚由两个学生按着。那是一个冬天,当时学生都穿着齐脚的长棉袄。先生要他将棉袄下半截翻到屁股以上,夹裤拷到大腿以下,然后用竹板在裤裆使力插下,让股部凸现出来再打。那位学生很犟,当时喊了一声先

生的“浑名”，结果股部和大腿被打得皮破肉绽，直到学东赶来求情才作罢。后由两个大一点的学生搀扶回家。我还亲眼看到那位学生老实巴交的父亲，含泪提着一篮鸡蛋给先生赔不是，并感谢先生对孩子的教育。这时我才晓得打屁股不是好玩的。

每天早晨上学，先生如未起床，就要到先生床前背昨晚放学时的夜书。若背得不好，先生就要罚跪，跪着读熟了才能站起来再背。背完夜书，接着上新书，在放中学前一般要背熟，否则不是罚站便是揪耳朵。下午上学后，学生照着先生开的引本练字，一天一面，写完后送到先生供桌上（即先生使用的大方桌）用手签或戒方押好。所谓戒方，长约六七寸，宽一寸多，高近两寸，是用结实木料做成的，有的还涂上颜料或油漆。学生读书打野、讲小话或打瞌睡，先生便在供桌上边拍戒方边喊“读！”以示警戒。写完字继续读书背书。此时，先生逐一审阅大字，写得好的，用红笔在字旁打上圈；写得差的字打上“×”，若写得潦草或字面不整洁，要打手板。接着上引本上的字，一天一行，四至六个不等。学生读熟后到先生那里“呈字纸”（即背引本），先生从中挑出难写的字，要学生用食指在供桌上默写，若背不上或写不出，轻则训斥，重则受罚。上完夜课放学，负责先生的，有时夜间还到学生家查看，若没读书或在调皮，第二天背不好书，决不轻易放过。上学放学来回的路上，若没有循规蹈矩地走路，或与人逗打，或遇长者没打躬作揖，一经先生知道也要“教育教育”。朝如斯，夕如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背书、体罚贯穿于私塾生活的全过程。

私塾生活单调，而体罚形式多样，背书的要求更是五花八门：每逢初一、十五，要在“至圣先师孔夫子”位前跪拜叩头，要总书，即“温故而知新”，背半月来所读的书；一册书念完要从头至尾背下来；五月放端阳学、十月放长学，要把这半年、一年的书全背下来。虽然“总书”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但允许学生站着摇头晃脑。我在前五年的私塾里背完了《四书》、《五经》、《幼学琼林》等。这些对我

后来的学习、研究与教学、写作，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私塾的教学普遍采用点教，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天资好的学生可以一年学多本书；天资差一些的，一年学不了一本也是允许的。

至于“学俸”（即学费），一般在上学前，由本墩台上较有影响的学东（即家长）先邀学生，后请先生，大约每年春学习三个月后，即“豌豆结角，先生议学”。由为首的学东，召集各家长，有时邀请附近私塾先生出席，由学东凑钱准备酒席，酒后“议关”、“写关”。即先议论，后经塾师同意写下每生全年学费。“关书”由邀请中的一位塾师执笔，在折叠的红纸上写“恭聘某某先生：西席一座，经同仁商议，其俸禄如下”，然后依次写上每生全年学费。确定学费的原则大体根据学生的程度、智力、家庭状况而定。有时以硬币计算，最多一年30元，最少8元左右；教师年俸最多260元，最少80元左右。若以实物计算，在我们湖区一般以稻谷计算，全年每生3~6石不等（每石70公斤左右）。总原则是塾师全年不少于一个男劳动力收入，即50石谷上下。程度高的经学先生一般一年在100~200石谷左右。若先生带了家属，每生每月大约给3~4升俸米（每升1公斤），另给一点烧柴；若没带家属，学东轮流同奉先生，各家总要设法买一点好菜。此外再没别的收费。遇到开明爱才的塾师，对那些天资好而家境贫困的学生，有时少收甚至不收。对个别家庭困难有特殊造就的学生，族大势众的由族费资助。

1944年秋，我随从兄进入私塾中程度较高的经学。忝列于毛市至瞿市（现属洪湖市）一带颇富盛名的经学先生项尧坪门下。学校当时无炊事员，学生自带柴米酱菜，由我的姑母代劳做成饭菜。这类学校规模和学生年龄一般是“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冠者即已成家）。住读生中我年龄最小，因而享受特殊待遇，常和项先生一起共餐。那时是抗日最后阶段，日伪对根据地封锁极严，群众生活都很苦。好在湖区一日三餐有鱼虾，还有藕梢、莲子、菱角一类

水产品。项先生不抽烟，不喝酒，爱吃韭菜炒鸡蛋。姑父母一家想尽办法，尽量让先生吃得好一点。

项老先生教课和一般私塾不同，不重死记硬背，而是先生开讲（串讲课文），学生开笔（学做文章）。我记得老先生第一次给我上课，先问我读了哪些书，开讲没有？我说书背了一些，但不解其意。老先生说：书读得熟对今后写文章是有帮助的，“四书熟，文章足”。继而拿出《论语》，先让我读第一章。接着问我：“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什么意思，我只会死记硬背，讲不出道理。先生开讲了：“子”就是孔夫子，整个《论语》都是记载孔子同学生的对话，共16章。“学”为首篇，乃务本之急，人道之门，积德之基。“曰”当说讲。“子曰”就是孔子说。“学而时习之”就是学要时常温习，就是温故而知新的道理。“不亦说乎”，“亦”当“也”字讲，“说”同“悦”，喜的意思。全句是时常复习，所学者熟，而心中必喜。接着对“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他只讲了“乐”和“悦”的意思差不多，要我按释上句的方式自己讲解。我思索良久后说：“就是有好朋友从很远的地方来了，不也很高兴吗？”老先生说是这个意思。“今后我们主要是讲，但我也不会每字每句每篇讲，你读了那么多书，若像开头那样讲，几时讲得完？我选难字难句讲一部分，你自己像刚才那样去理解我没讲到的，不懂再问我。”这可能就是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我茅塞顿开，想不到书中有那么多丰富的意思，而且不再像从前那样背书、打板子了，第一次感到学习的“悦乎”“乐乎”。我心底像信神一样敬仰这位虚怀若谷的好先生。

讲完第一章后，老先生要我开笔写文章。题目是《爱亲》。他简单讲了要求，我壮着胆，不到大半天写了约莫200字，尽是“之乎也者矣焉哉”之类。誊好后交给先生，想不到先生边看边点头边捻胡须，清瘦而绷着的脸上露出了少有的微笑，我如释重负。先生将我叫到供桌旁当面批改，对“父母亲乃人之出身根本。无论贵贱尊卑，生者父母，供衣食求学者亦父母也。乌且反哺，羊尚跪乳，何况吾人

乎”等句，打了许多红圈圈，并批语“立意很好”四字。先生批阅后高兴地拍着我的头说：想不到你小小年纪（当时 11 岁），试笔不凡，文章虽短，但很通顺，只要用功，前程无量。

年底，毛家口的日军撤至县城，项老先生回家执教，我们学生也随之离家 20 多里到项家门老先生家就读。那个村子只有七八户人家，项家坐落在村西头，从一个凹字形门进去是两进两厅。中间是大天井，屋旁西侧是长仆屋。前面作厨房餐厅，中间是储藏室，后面是厕所。天晴下雨，白天夜晚学生上厕所无需出门。沿着仆房旁偏西走 200 米许，便是一个专供学生活动的场所。那里有学生自己挖的沙坑，砍伐家树做的跳高架，就着树绑有单杠。周围是密密麻麻像城墙似的各种杂树与竹林。场地上还植有桃李和各种花草及药材。其中有压条再植，四季长青的夹竹桃，芬芳的梔子花；还有像黄花菜一样的冷水丹、仙人掌和各种菊花。再回到室内，第一层左侧是老先生的爱徒杨丙章学友的蒙馆，右侧住着守了八年空房的老先生的儿媳和孙女（先生之子雨源投身抗日战争，一直戎马倥偬，未曾归家），丹墀东边住着先生十分孝敬的母亲。西边则是我和从兄等住读之处。先生供桌摆在正堂中间。当时我 12 岁，师娘第一次见到我说：“怎么，这样小的伢儿也到这里来读书！不想家吗？”于是讲书时特让我和他们的掌上明珠、唯一的小孙女笋声坐在供桌的两旁。我在私塾八年中间同窗过的女生，只有我家紧邻的独生女林仲春。当时女孩子读书的少。

私塾学生进入那个层次后，即将走向社会，先生讲书很少，主要是靠自学与习作。项先生允许学生看其他文艺作品，但对《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态度冷漠，特别是对《张献忠传》更不屑一顾。同时也选讲《资治通鉴》、《古文观止》、唐宋诗词。我们几个童子有时还给吃点“偏食”，如《聊斋志异》、袁枚的《随园诗话》和《唐诗三百首》等。先生很重视书法，曾怀着复杂情感现身说法：“我要你们习字，有如大脚婆婆要她的女儿缠足一样。我书法不好，碰

到有些场面很尴尬。”过去有俗语“书是门面，字是招牌”“教书容易应酬难”。有些至亲好友婚丧嫁娶，逢年过节总要写对联。先生在项家河时，这类应酬主要是我表兄厚祥代劳。在项家门时，则是我的族兄计海和计湖代笔。

老先生还有一个习惯，晚饭后爱到田边、河边安静的小路上散步。多数时候带着我们几个小学生，边走边谈论田园风光，边讲吟诗作对。如“星沉水底”对“月照天边”，“吴牛喘月”对“夏犬吠日”等。先生爱读李白、杜甫、陆游、辛弃疾的诗词。他认为这些人的诗词豪放、有气势，对生活态度积极。对那些即使写得再好而格调低沉的诗，他不爱读，也不教学生。甚至连“老大徒伤悲”这样的名句也不以为然。

老先生学风严格，治教严谨，学生都面壁而读。上经学的学生差不多都有一口书箱，高约一米，宽近两尺，各自放在书桌前方，以挡视线，便于集中注意力。有的甚至还在书桌前空隙处糊上白纸。民房光线本来就差，空气不好，私塾走出去的学生大多面黄肌瘦、体弱多病、手无缚鸡之力。即使这样，大学友们人大心大，虽然先生晚间一般不许学生出门，但锁不住那些成年的学友。记得有一次学到深夜，不知哪位主谋，由两个学友作向导，大伙到距校三里的何家场偷老百姓的鸡。途中不巧遇上了毛市乡警队，书呆子们吓得乱跑。好在其中一位大学友与其头目认识，才避免了一场事端。先生获悉气愤不已，将我 from 书房叫到正堂中间跪下，大学长们都不敢吭声。我哭丧着脸望着先生的孙女笋声，示意求助。原来我听学长们说，先生发火，师娘无能为力，只有奶奶出面才能平息。机灵的小笋声即跑到前厅请来拄拐杖的“老太君”将我扶起，这场风波才算平息。不过摸瓜摘果的事总有，我曾和几个“童子”摘过邻家尚未成熟的桔子，由于吃得太多而拉肚子。

到1946年放长学，我告别项老先生及其一家，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1954年，我任别口中心小学校长之际，曾登门拜访项先